

12.05
銅陵文史資料選編

第一輯



44240/01

前 言

铜陵，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建县制于南唐保大九年（公元951年），距今一千零三十二年。铜地历史悠久，物产丰富，素有“八宝俱全”之称。尤以盛产铜矿而著名。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北朝齐梁时代，就已“置炼铜场于铜官山下。”到了唐代，炼铜业已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铜官山下出现了如大诗人李白所描绘的“铜井炎炉敞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的气势宏伟的冶炼场。

山川壮丽，名胜荟萃，乃铜陵另一美姿。因而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名人雅士，如李白、苏轼、王安石、黄庭坚、汤显祖等人都相继在五松山下、灵窦泉边留下了揽胜的足迹，写下了许多赞美铜陵的华章。

然而，铜陵的历史和命运真正开始为铜陵人民所掌握，是起始于共产党的光辉照亮了这块“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大地之后。自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以来，铜陵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起，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国家的解放，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洪流。自此，山川日月重光，志士仁人云涌。先辈们用不屈不挠的斗争，赶走了日寇，埋藏了蒋帮，建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铜陵。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用无数光照天地的悲歌壮曲，谱写了整整一部光辉灿烂的铜陵近现代史。

为了承前继后，惠及子孙，用生动的史实向广大青年一代

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从而编写一部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铜陵近现代史，已为当代共产党人所责无旁贷。出于此因，铜陵县政协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政协主席孙运松同志的主持下，于一九八一年起，开始了广泛搜集和认真编写铜陵文史资料的工作。献给读者的这册《选编》，正是我们三年来工作的部分结晶。鉴于开始工作的八一年，是建党六十周年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因此着重搜集了本辑所编的这部分铜陵现代革命史料以兹纪念。在征稿和编选过程中，曾得到了省、市政协的指导和各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得到了当年在铜陵领导和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如张伟烈、张世杰、杨明、朱农、陈爱曦、姚志健等许多老同志，均先后在百忙中为我们写稿和提供、校正了许多重要史料。张世杰同志还千里挥毫，亲笔为本辑题写了书名。趁此印刷之际，仅向这些同志和各有关方面表示由衷的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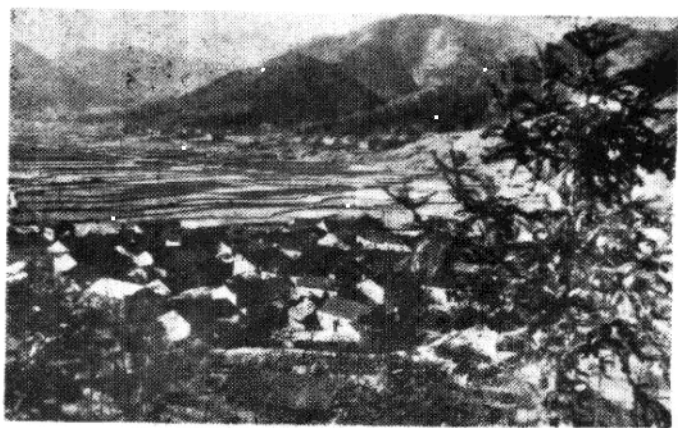
由于我们历史知识的贫乏，编史经验不足，以及思想文字水平所限，本辑《选编》中一定会有不少的缺点和讹误之处，印行后，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铜陵文史资料选编》编辑组

一九八四年一月



抗战时期铜陵县人民政府机关驻地之一 陈孝磁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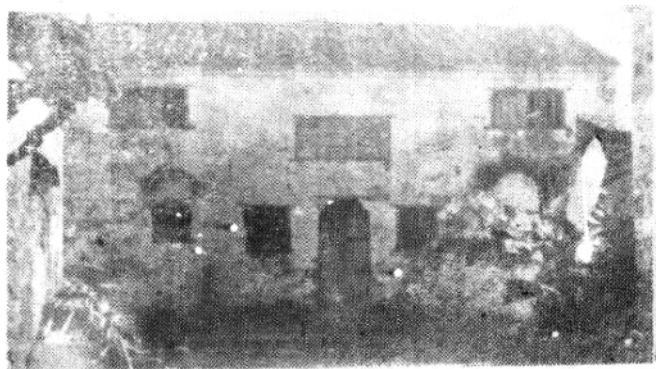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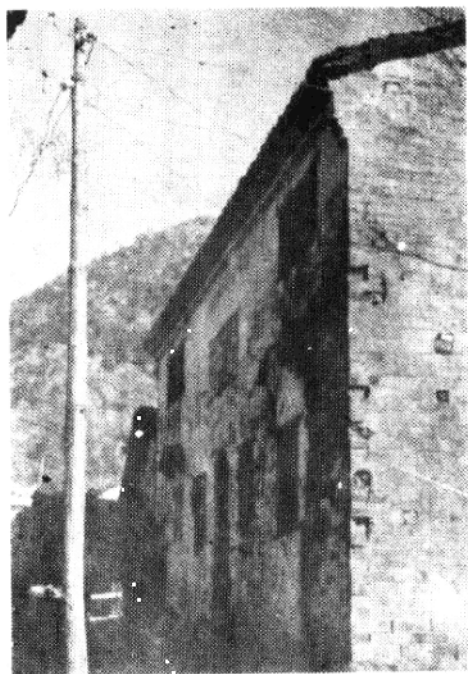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铜陵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钟鸣舒家店全景 陈孝磁摄

▽ 抗战时期中共铜陵县委机关驻地之一（一）

周宗瑜摄

◁ 中共铜陵县委机关驻地之一（二）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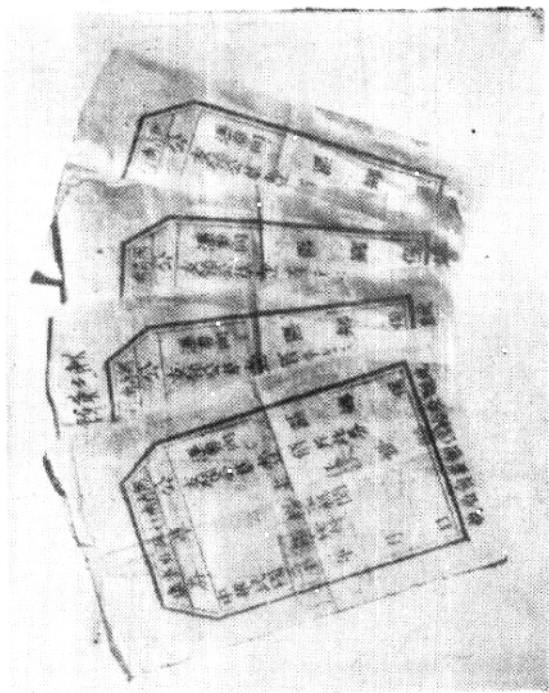
陈孝磁摄





抗战时期新四军发放的“大江币”

姚学胜献
陈孝磁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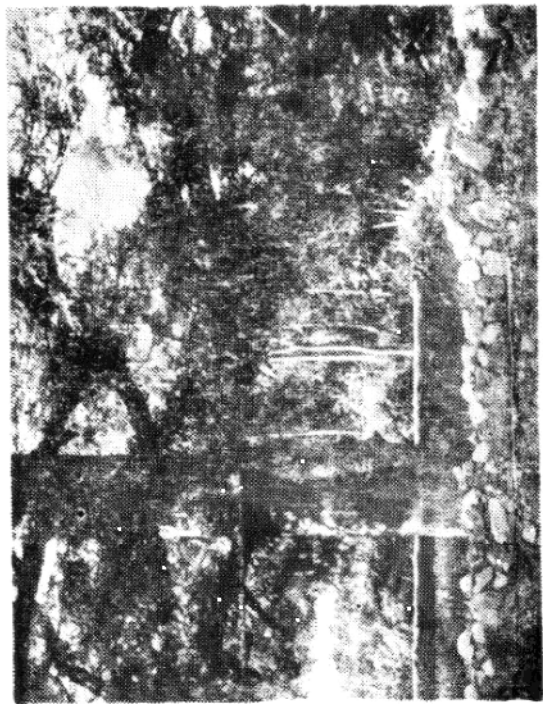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铜陵县人民政府发放的“公草券”

陈英士献
陈孝磁摄



铜陵革命根据地和游击队活动区之一——“杉木王”（一）

陈孝磁摄



“杉木王”局部

陈孝慈摄

目 录

（一）铜陵地区早期的革命活动与党组织的建立	文史组采写 陶应明整理	（1）
（二）铜陵犁桥地区的锄奸斗争	孙 林	（5）
（三）程惠文与“大东”洋行	孙运松	（15）
（四）回忆我的父亲陈尚和烈士二三事	陈孝养	（25）
（五）抗战时期铜陵沿江地下交通站	洪 亮	（33）
（六）回忆革命老人“福奶奶”	孙运松 叶光华	（40）
（七）奔袭	刘 英	（49）
（八）抗日战争时期的铜陵青年抗敌协会	孙运松	（53）
（九）挂岭阻击战	孙运松 阮学富	（60）
（十）我的一家投身于地下交通站	胡 坚	（64）
（十一）抗战时期铜陵的税务工作	孙运松	（72）
（十二）在顺安日伪组织里的活动片断	周赐德	（79）
（十三）皖南游击队惩办国民党特务许志茂	孙运松	（89）
（十四）攻打朱村伪乡公所碉堡始末	徐世达等口述 范 守 恕整理	（94）
（十五）武装侦察敌人江防纪实	孙运松	（105）
（十六）随国民党铜陵县政府逃跑散记	丁克骏	（114）
（十七）陈羲和《泡桐》及其在泡桐学术史上的贡献	潘法年	（119）

革命史料照片插页

- 1、铜陵县烈士塔
- 2、抗战时期中共铜陵县委机关驻地之一
- 3、抗战时期新四军发放的“大江币”
- 4、抗战时期铜陵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钟鸣舒家店全景
- 5、铜陵革命根据地、游击队活动区之一——“杉木王”
- 6、抗战时期铜陵县人民政府机关驻地之一
- 7、抗战时期铜陵县人民政府发放的公草卷
- 8、范家湾烈士墓

附录：历代名人题铜陵诗选

李 白（唐）

我爱铜官乐……………（1）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1）

王安石（宋）

顺安临津驿……………（2）

灵窦泉……………（2）

苏 轼（宋）

陈公园……………（2）

王十朋（宋）

铜陵阻风……………（3）

汤显祖（元）

过铜陵……………（3）

铜陵地区早期的革命活动

与党组织的建立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从此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序幕。全国各地以反帝反封建为标志的革命斗争迅速兴起，铜陵地区也相继发起了类似的革命活动，影响较大的就是大通的学生界、商会以及工人群众联合组成了五百多人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惩办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革命口号，广大学生、工人、职员走向街头，到处宣传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罪恶行径，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英勇斗争。接着就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抵制日货的运动，对日货查搜，对日货禁销，对日货拒购！这次斗争虽只持续了四五天，但在当时社会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一九二一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全国范围内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铜陵地区的革命活动亦随之兴起。一九二四年，铜陵的旅外学生（据说有极少数在外地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在王同荣、王同根（后来他们都走向革命的反面）、余贻谦等人的组织与领导下，开展传播新文化的活动，以演剧等文艺形式，反对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因而遭到封建势力的顽固抵制。为进一步打击封建势力，四五十学生组织起来在县城闹风潮，以清算粮款为名，胁迫伪县长就范，后来遭到伪当局的武力镇压。

压，把这次革命斗争打了下去。一九二五年，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制造了罪恶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各地以不同的斗争方式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一时间，罢课、罢工、罢市不断掀起高潮。六月间，铜陵大通学生代表余贻谦等人组织了外交后援会，对制造争端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卖国者表示强烈的抗议，同时举行了学生、工人及各界人士的游行示威，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帝国主义滚出上海！”“抵制英日货物！”“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队伍愤怒捣毁了“太祀英美烟草公司”的招牌，大部分商人不进外国货，大部分旅客不乘外国轮船，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影响很大。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国民党新军阀爬上统治地位，在全国各地大肆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对共产党及革命群众实行血腥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在这危急的关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建立红军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任务，革命工作中心由敌人统治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从此，农民革命斗争烽火遍起，铜陵也不例外，一九二九年，发生了何俊喜、梅占业等人组织领导的湖城涧农民暴动，暴动时遍插红旗，声势显赫，提出了“万贯家财我有份，穷光蛋不能混，跟我们一阵，闹出事来有我们问！”以及“打土豪，分田地”，“铲富济贫”等口号，并计划奇夺顺安自卫分团的枪枝，建立苏维埃政权。因当时党的上层左倾路线的错误，也由于计议不密，遭到伪自卫团的清剿而失败。何俊喜、梅占业在不同的地方先后遭到逮捕，后在铜陵北门城外壮烈牺牲。

铜陵人民早期这些革命活动是全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受到挫折，但在客观上不同程度地打

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对当时全国范围内的革命斗争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援，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在斗争实践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锻炼，必然为党组织在铜陵地区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二九年春，凌霄同志受安庆中心县委的派遣来到铜陵开展革命工作，首先住在章啸衡同志家里，进行秘密串连，发展党的组织，从此，铜陵这块土地上真正播下了红色的革命种子，不久就发展了章啸衡、郑启书等人成为共产党员。当时何俊喜、梅占业等同志经常出入章啸衡家，关系甚为密切，因此不能设想他们与凌霄同志没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二九年湖城洞农民暴动决不可视为与铜陵党组织毫无瓜葛的孤立的偶然事件。一九三一年，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及发展党员的实际情况，在章家洲正式成立了铜陵第一个党小组。同年五月，皖南地区的党组织派遣疏冠卿（即疏日安、疏拓夫化名王冠卿，号称王大个子）同志来铜工作，凌霄同志则调离铜陵。当时主要任务是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农民抗租抗息，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并在广大农村发展互济会，贫农团（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到一九三四年，全县已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同年十一月红军抗日先遣队方志敏同志率部北上，要途经皖南，为迎接这支队伍，遵照上级党委指示精神正式成立了铜繁无县委，疏冠卿同志任县委书记，沈醒吾任组织部长（又名沈默、沈和尚、沈了知）、陈士田、查全敏、陈珍仔等均为县委委员，有的还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不久，又增选姚克家（又名姚志健）为县委委员，为加强领导，又成立了犁桥、胥坝、朱村、宋家岩、城北五个区委（其中的胥坝区又为铜繁无三县所共有）。李玉祥、陈珍仔、徐仁宽、姚克家等人分别担任各区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党员人数又有较大的发展。嗣后因蒋

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对革命势力实行残酷镇压，形势险恶，处境困难，白色恐怖浓重，党的组织和革命进步团体，屡遭摧残，铜陵党组织活动也难以开展，情况极为复杂，由于贵池胡先友（此人曾与凌霄同道来铜发展党的组织）的叛卖，也由于当时任县委宣传部长查全敏的变节，铜陵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搜捕、大残杀，只有疏冠卿、沈醒吾、郑启书等极少数人逃离外地，幸免受害，七百多名共产党员大多数被捕，铜陵党组织遭到严重的挫折和破坏。

还有一种情况，在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曾一坚同志持江西革命根据地某党组织的介绍信，途经上海来到铜陵边境金榔山区，以作柴炭生意和待人看病为掩护，奔走在三条冲、钟鸣一带，在农民群众中秘密开展革命道理宣传，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发展党的组织，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就发展了党员二百余人，并在狮子山、九栏、水村、三条冲等地分别成立了党小组。当年正是大旱之年，山区粮食籽粒无收，加之反动派的横征暴敛，农民生活极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农民群众，发动了武装暴动，由花良虎同志（1939年8月壮烈牺牲）出面领导，计划夺取大地主的粮食和枪支，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暴动时在叶山、水龙山、狮子山等处，遍插红旗，声势浩大，遭到反动武装的镇压，并进行疯狂地搜捕，暴动失败，曾一坚同志也转入隐蔽。一九三五年上半年的白色恐怖更为严重，曾一坚同志被迫离开，这个地区的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与摧残。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上级党组织派张伟烈等同志来铜陵工作，铜陵地区的党组织才重新得到恢复发展与壮大。

（陶应明整理）

铜陵犁桥地区的锄奸斗争

孙 林

在日伪军的清剿面前

一九四一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位于长江南岸的铜陵敌后，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处于暂时的低潮。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狰狞面目的彻底暴露，铜陵敌后抗日根据地里伪军、特务、恶霸等各种反动势力，也猖獗地活跃起来。他们拼凑各种日伪军政组织，疯狂迫害我地下党员、抗日群众组织和革命军人家属，大肆搜捕我在“皖南事变”中突围途经铜陵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日寇也乘势步步推进，到处设据点，建碉堡，对我游击区进行扫荡。日、伪、顽串成一体，以十倍的疯狂妄图一举扼杀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时，钻进革命内部的极少数投机分子，也在这时动摇离队，有的甚至叛变投敌。一时间，腥风血雨笼罩着整个铜陵敌后。

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皖南事变”后不久，从事变中突围出来的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同志便来到了铜陵敌后，给了敌后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当时我在铜陵敌后杨家坦孙村任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县委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记得李步新同志来铜陵后，曾召集敌后县委朱农、陈尚和等负责同

志开过一次重要会议。李步新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坚持铜陵敌后抗日斗争的许多重要指示。根据这个指示精神，敌后县委的第一个斗争部署，便是发动群众，在敌人活动最猖獗的安平、栖枫、石佛、忠信、犁桥等乡，采取各种手段，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狠狠打击敌、伪、顽的反革命嚣张气焰，粉碎敌人的清剿，在艰难的劣境中，开辟新局面，鼓舞群众的斗志。要让群众知道，也让敌人知道：新四军是打不垮，杀不尽的！县委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在果敢地处决了掌握几个乡伪政权的大恶霸、汉奸查啸衡，又利用敌人消灭了安平乡一营伪军之后，很快便将打击的重点移到了犁桥。

犁桥地处铜陵县圩区的中心地带，一条横贯水乡的内河流经这里。两道圩堤上一座小桥沟通南北。东北去十里，便是大江之滨的坝埂头，跟无为县的江心洲遥遥相望。西边直通汀洲，汀洲对岸便是叶家洲，“皖南事变”前，县委机关曾一度住在那里，那里也是著名的沙洲抗日游击大队的活动地方。东有水路通向繁昌的荻港。南靠东湖，是我游击健儿经常出入的广阔水区。又跟栖枫、忠信等乡接壤，是通往县城和敌前县委的必经之途。犁桥在当时，不仅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也是敌后广大农村的集市贸易中心。日寇占据犁桥后，国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土豪劣绅、地头蛇在这里结集，投靠在日军的卵翼之下，破坏抗日，欺压人民，过着醉生梦死的荒淫生活。

“皖南事变”后，日寇进一步加强了对犁桥的兵力部署。一个分队的武装日军住在碉堡里，碉堡外围用层层铁丝网包围着，几个路口，日夜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日军盘踞在这块咽喉之地上，给南来北去的新四军造成困难。“皖南事变”以后，有好几次晚上，我们的部队夜间经过犁桥附近时，均遭到鬼子在圩埂边的伏击。有一次在张家桥，跟犁桥的鬼子兵打了